

文物保护利用与新质生产力探索

李六三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对新质生产力作出系统阐述,在全国两会上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有助于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是在科学继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作出的极具前瞻性和原创性的理论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文物领域创新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背景与概念内涵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纵观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无一不是由新技术带来的新产业,进而形成的新生产力。哪个国家能够率先在关键性颠覆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哪个国家就能够塑造未来发展新优势新动能,赢得全球新一轮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创新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将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推动我国科技发展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在移动互联网、数字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与非凡成就,走在世界前列。与此同时,我国科技发展还存在一些短板,一些关键与核心技术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依旧客观存在。一些国家采取政治、经济、外交的多重手段来打压我国的科技创新,防止我国获得先进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新质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先进生产力的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在文物保护领域的体现和不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文物事业取得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保护理念不断创新,科技手段不断进步,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提升。

文物保护利用中的新质生产力

在高新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上,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为抓手,围绕重点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示范,通过跨行业跨学科联合攻关,不断提升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科技支撑能力、文化遗产保护修复的科技创新能力、文化遗产传承利用的科技保障能力;大力推进文物数字化工程,推动文物资源数字化转化,进而实现永久保存与开放利用;综合运用智能导览、虚拟漫游、增强现实、人机交互等手段,将前沿科技与古老文物有机结合,有效提升文博服务现代化水平;促进文物与相关行业的深入融合,实现“文物+旅游”“文物+教

育”“文物+创意”等领域的业态创新、模式创新。

在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上,秉持文物保护与生态保护协调一致的工作理念,将文物保护纳入大生态保护范畴,推动文物保护规划与生态保护等规划“多规合一”,统筹推进文物保护与生态保护区、旅游景区建设,实现文物保护与周边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助推美丽中国建设;在大遗址保护时注重周边环境的优化美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善乡村面貌,提升文化品质;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与乡村振兴、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美丽城镇建设有机结合,加大保护修缮力度,改善基础设施,促进活化利用、开放共享;在古建筑及彩绘保护修复工程中,采用传统工艺,推广应用绿色建材,提高文物领域节能降碳水平。

在高素质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文物局出台政策文件,在文博事业单位的用人机制、人事管理、能力建设、绩效分配、职称评定等方面寻求突破口,不断稳定和壮大基层文物保护和研究队伍,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提升人才队伍整体素质;以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为依托,大力培养科研领军人才和青年骨干人才,建构学术带头人、科研骨干和青年后备力量的人才梯队,对作出突出贡献人员给予奖励,有效提振了文博人才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存在问题和不足

当前,文物科研机构小散弱,科技人才严重不足,文博领域科研单位管理体制机制尚不健全,科技奖励激励不足,高新技术有效供给尚不充分,监测预警、攻克文物病害机理,科技支撑文物防灾减灾能力亟待提升。基础理论研究和数据积累还显薄弱,数据整合和开放共享机制还没有广泛推广。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还显不足,各地对文物领域完整、准确、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认知不够充分,“拆真建假”现象时有发生,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传统村落保护,博物馆建设,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等过程中存在贪大求洋、大而不当现象,文物建筑日常养护和节能改造还没有得到普遍推广,不利于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以科创中心建设为契机,大力发展文物领域新质生产力

国家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中心(以下简称“科创中心”)建设是国务院“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之一,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大数据中心和科技平台,将全面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文物+科技”催生新技术、新材料、新模式、新业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成为文物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搭建文物科技创新基础平台。科创中心将围绕国家文物保护利用重大需求,加强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系统集成,从根本上提升国家文物保护利用原创理论、保护材料研发、装备工具发明和技术工艺创新能力,解决文物保护利用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满足世界级原始创新需求。与高新技术企业加强协作,将空地一体化卫星互联网等高新技术应用于世界遗产地监测,做到实时、精准、高效,特别是做到对古建筑附近山体监测,可预测山体滑坡对古建筑和古遗址的破坏风险;将高分遥感技术、卫星、无人机等高新技术应用于文物保护单位等监测预警,推进我国文物保护方式由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全方位整合和优化文物保护设备、技术、人才等资源配置,引领国内文物保护科技发展,成为推动我国文物保护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重要平台和窗口;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促进国际文化遗产科技合作,培养高端科技人才,切实提高我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构建系统性业务发展模式。科创中心是理论研究与保护修复实践的综合机构,将积极构建文物认知、诊断、评估、修复、研发为一体的文物保护科学理论与技术体系,支撑“创建中国传统建筑理论”和“开展技术装备、修复材料及工艺等技术研发”的需求,利用科技手段创建中国传统建筑理论,解释中国传统建筑的奥秘,在国际建筑行业争夺中国传统建筑的话语权;着力解决各类文物病理病害分析、修复材料、专利技术研发、文物科技鉴定和科学修复等问题,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贝叶经保护修复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应县木塔结构稳定性评估与保护研究》《壁画高精度多光谱高效采集处理装备与应用示范》等重大项目为依托,发挥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优势,开展文化遗产的综合价值、保护理念、保护技术、展示利用研究,用科学的方法丰富中国文物保护理论,推动文物保护关键共性技术与材料研发、专有装备研制升级、科技成果应用示范、标准化建设等,推动构建多学科协同、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链条业务布局;将互联网、数字化等高新技术的创新因素融入文物保护利用的全过程,通过算法、算力、平台等让文物资源重新融合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有效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大幅提升文物行业的影响力、传播力。

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绿色生产力。科创中心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将深入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科学规划建设规模,在设计、施工、材料和运行管理等方面,全面推行绿色低碳建造方式,尽量应用绿色建材。积极引进应用先进适用技术,在不影响功能的前提下整合优化,降低运营维护成本,实现楼宇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管理。科创中心建成后,将推动文物领域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探索,制定文物领域节能减排标准规范,推动历史建筑绿色化更新改造、合理利用,大力培养传统工匠队伍,传承传统建筑绿色营造方式,强化绿色建筑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推广文物保护利用绿色发展新模式,推进文物科技产业创新发展,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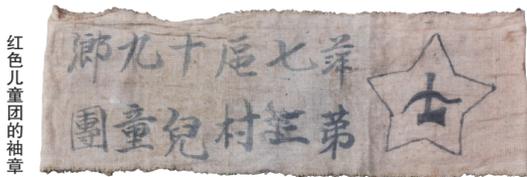
加强文物科技人才培养。科创中心将完善文物科技人才培养、选拔、使用、评价、激励机制,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注入活力。文物保护涉及防、保、研、管、用等诸多领域,材料、工艺、装备和集成技术研发都有巨大潜力,迫切需要造就一支科技研发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过硬的文物科技人才队伍,推动考古勘探、分析测试、监测预警、文物修复、文物鉴定、展览展示等水平全方位提升。当前,文物保护修复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政策供给、加大投入等,畅通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通过建立科学完善的高技能人才评价机制,激发高技能人才创新活力。同时,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推进文物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建立适应新时代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队伍。通过全面加强文物科技人才培养,将高素质人才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胜势,为文物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以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助推文化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力量。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党委书记)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更好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见证少年儿童运动的红色印记

黄洋



红色儿童团的袖章

在江西萍乡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陈列着两件珍贵的革命文物——红色儿童团的袖章和飘带,质地均为棉麻纤维。袖章长18厘米,宽9厘米,呈长方形,右边是五角星加镰刀、斧头组成的图案,左边是从右至左呈两行排列的文字:“萍七区十九乡第三村儿童团”,背面印有“张文泉”的名字,文字和图案均为毛笔书写。红飘带长90厘米,宽6厘米,两头呈三角形,手工缝制而成,上有污渍。这是1933年宜春苏维埃政府萍七区十九乡第三村儿童团团长张文泉佩戴过的红袖章和红飘带。虽然历经岁月洗礼,原本鲜红的布料早已褪去了色彩,但不变的却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少年儿童一心向党、紧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革命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认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逐渐高涨。

1929年秋,中共湖南省委浏阳县县委派到江西省萍乡县北部的桐木地区开展工作。他们以教书为掩护,发展了一批贫苦农民加入共产党,于1930年成立浏阳县第九区苏维埃政府办事处,直属浏阳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同年6月浏九区改为萍北二区,7月又改为萍七区,下辖22个乡。1930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下的湘东特委、萍乡县委在桐木重建。桐木划归萍乡县委领导。后因地理位置和革命形势等原因,1931年10月,萍北部的长平、上栗、桐木作为第五、六、七区划归中共宜春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

在党的领导下,各级苏维埃政权领导当地民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为了充分调动各阶层力量,党组织将9—13岁的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成立儿童团,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制作配有统一标志的袖章和红飘带,供儿童团员执行任务时佩戴。每位团员发一个袖章,班长、排长、连长、团长才有飘带。由于桐木当时划为萍北第七区,因此袖章上标注有“萍七区”字样。

儿童团们可以免费参加苏维埃政府开办的“列宁小学”或“红军小学”,既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理论,也参加军事训练。萍七区儿童团员读过的《苏区儿童读本》中这样写道:“请卫狗,好戏酷!牵牛羊,烧房屋,抢床上被,挑走仓里谷。”“国际旗,鲜又红,镰刀斧头在当中,你爱我,我爱它,大家对它三鞠躬。”张文泉曾经负责给儿童团教唱歌,他回忆当时教过一首《儿童团歌》,歌词唱道:“我们儿童年纪虽小,革命精神好。国民匪党、豪绅地主,等我来打倒。肩扛木枪冲锋前进,巩固我团体。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定是我们的。”

学习之余,儿童团员们必须参加集中训练,每天早上跑操、练步伐、练习操木枪动

作,同时担任起站岗放哨、检查路条、传递信息、查处封建迷信活动和进行宣传演讲等任务。执行任务时,他们戴上红袖章,系着红飘带,手持木枪,自信又威风,“平日尽淘气的黄毛革命却成了一股重要的革命力量。他们监视敌人,对破坏农会或聚众赌博的坏分子严格执行揪揪吧、打屁股等刑罚,替农会走脚报讯,传递条子等;向豪绅罚款,尤其是开展武装斗争中,收集了不少的民间破铜烂铁等充当土炮子弹,解决了弹药不足的困难。”

儿童团们积极参加苏维埃政府拥护红军委员会的活动,为红军当向导、做侦探、抬伤病员等,必要时还协同作战。每周星期六,便和大人們一块去义务耕种公田,将收割的粮食送给军属;过年过节时,给军属送光荣灯和慰问信;红军过境时唱歌跳舞欢迎。湘鄂赣苏区出版的《列宁青年》第25期有一篇报道写到红军在经过宜春地区时“妇女同志歌,儿童口号队,好个真热闹来慰问我红七师部队。”少年儿童在党组织的号召下,俨然成了小主人,经常出现在各个场合,充分展示了苏区少年儿童当家做主人的风采。

从1933年11月起,国民党反动派采取“步步为营,碉堡推进”的战术,对苏区进行围剿。1934年3月初,宜春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遭到破坏,革命活动转入游击战争,工会、妇女、少先先锋队、儿童团等民众组织被迫解散,儿童团员们都藏了起来。张文泉回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查,有一次我差点被抓,结果把我家里的东西全部拿走了。由于白色恐怖,查出这些东西是危险的,所以我就把儿童团袖章和飘带就用竹筒装好塞进墙洞内,用泥巴封好。”1968年在修葺张文泉老宅时,拆墙砖的工匠无意在墙中发现一竹筒,便拿给他看。张文泉这才记起自己曾经把这两样东西藏在墙壁里。

1970年,张文泉将这两件文物捐献给桐木公社阶级教育展览馆展出,1972年7月被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征集,2004年被鉴定为国家三级文物,2020年升级为国家二级文物。如今,少年儿童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参观时,都会在展柜前驻足良久,仔细端详烽火岁月里儿童团员佩戴过的极具历史价值的标识;认真聆听革命战争年代儿童团员英勇斗争的故事;用心感悟党旗召唤下,少年儿童自立自强的革命意志。今年是中国少先先锋队建队75周年,红色儿童团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将激励新时代中国少年儿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永跟党走,敢挑重担,勇做栋梁。

考古成果的展示与活化利用

以“探索获国——以姚河塬为主宁夏出土西周文物特展”策展为例

王怡 关静婷



姚河塬遗址俯视图

近年来,广大文博工作者不断开拓工作思路,致力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而让考古和历史文化遗产不仅“要火”,更要“活”。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以下简称“宁夏博物馆”)筹划“探索获国——以姚河塬为主宁夏出土西周文物特展”(以下简称“探索获国展”),旨在以孙家庄西周墓、姚河塬西周遗址出土的甲骨、骨器、陶瓷器、玉器、贝蚌器、青铜器来解读宁夏地区在西周时期的历史地位。

1981年宁夏固原孙家庄西周墓及2017年姚河塬西周遗址的发现,证明西周统治势力和文化跨越了六盘山,出土的殷商、刘家、寺洼、先周等文化遗存,实证了宁夏数千年的文明史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展览集中了宁夏博物馆、宁夏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博物馆藏西周时期的珍贵文物,为研究西周时期政治辐射范围、周王朝与西北边疆的关系、西周诸侯国——“获国”都邑城址布局及其墓葬制度提供了新材料。

博物馆陈列展览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活化”形式。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与考古学研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以“物”证史,以

西周时期文物488件(套),用实证的方法,结合宁夏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探索西周王朝早期西部边疆地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特征。展览目、定位及意义。“探索获国展”是对宁夏地区西周文化进行的全方位展示,也是探索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挖掘阐释宁夏历史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之宁夏篇章的具体实践。展览通过以物鉴史、以物证史的叙事方式,让观众了解宁夏西周历史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展览的内容设计。探索“获国”与周王朝的历史社会关系,寻迹姚河塬遗址的墓主身份,透析两处墓葬背后所内涵的富有宁夏地域特色的西周文化,是特展设置的三个单元内容。

“寻迹获国”,在西周大的历史背景下,重点突出宁夏西周时期的两处重要遗迹。孙家庄西周墓是宁夏地区发掘的首例西周墓,填补了宁夏地区西周历史的空白。但由于孙家庄西周墓当时考古发掘资料较少,因此该单元加强了姚河塬西周遗址如何被发现、地理布局、城墙等内容的研究展示。“解读获国”,此单元主要解读宁夏地区西周墓葬的形制和结构,具体分为姚河塬西周遗址的高等级墓葬、铜铸作坊、祭祀坑和车马坑四个部分;对其的研究与展示,可以让人们了解到西周早期西北边疆各族群社会关系,其次是让人们了解“周礼”文化对西北部族影响之深。“宝藏获国”,该单元通过文物的具象展示,让人们了解到宁夏地区商周时期人们生产生活的侧面,揭示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程度,侧面反映华夏大地各部落的文化融合方式及特征。

展览的形式设计。为了体现策展的理念——探索,展览的背景色以赤红色、黑色为主,色调偏

暗,观众更容易将目光集中至文物之上。同时,赤红色、黑色、米褐色为西周时期所流行的颜色,在配合人工光源的基础上,以三色进行拼色搭配,最大程度塑造了展览的神秘感并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线下宣传品的设计选用青铜绿,增加了展览的历史底蕴。

宣传推广

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传播与服务机构,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贡献着力量,并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在宣传推广方面,配合合理的空间规划和艺术表现,展示考古发掘、科技保护、文物陈列、历史解读、文化传承等一系列过程,以一种和谐、融洽、有吸引力的方式让文物真正“活起来”。为了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宁夏博物馆特以融媒体的方式,将官网、微博官方号、微信公众号纳入一体推广的传播体系之中。通过各种渠道向观众介绍展览背景,展出文物、展期、目的和意义等情况,进而宣传中华文明交融史,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博物馆,了解西周时期的宁夏历史。这些活动的展开,第一时间吸引了42万余人关注展览的微博号、微信公众号,而且在通过网络问卷、网络评论的方式倾听网友意见之后,宁夏博物馆与众多私密直播间形成了互动,涉及腾讯网、快手直播、凤凰网、新浪微博、今日头条等多个平台直播间156个,在同步播出博物馆展览信息的过程中,最大可能地让观众第一时间在线阅读特展的相关文展信息。

推出数字化展厅。“探索获国展”数字化展厅运用了导览地图、交互热点、专题区域快速进入、自动旋转观看等丰富功能,通过图片、文字、视频、音频等多媒体信息,带领观众深入全面地了

解展览,多角度欣赏精美文物,足不出户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推出系列文创产品。“探索获国展”策展初期,为配合展览挖掘在展文物的文化价值,通过充满时代风尚的设计,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日常生活,研发相关文创产品,让观众将文创带回家,并将对展览的独特体验从博物馆延伸到家里。

社会教育活动

特展预热和在展期间,宁夏博物馆分别邀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商周研究室主任张天恩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马强举办《姚河塬遗址发现对商周考古研究的意义》《宁夏两周考古发现和研究》学术讲座。

为了为青少年和儿童创造文化体验场所,根据宁夏两处西周遗址出土的具有代表性的精美文物,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教育活动。这些社教活动不仅对展览进行了细致地展示宣传,也更好地促进了宁夏博物馆整个社会教育活动模式的不断更新完善。连续不断的社教活动,让策展团队意识到,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有责任从历史文化爱好者以及青少年儿童提供更多获取知识的平台、场所,这样才能形成宣传体系与群众之间的有效互动机制,推动文博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探索获国展”集中展示了宁夏地区西周时期出土的珍贵文物,展现了宁夏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和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也揭示了古代先民的智慧与创造力。不仅让我们深入了解西周时期宁夏地区的社会风貌、文化艺术和生活习俗,更是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